

# 朗润学史丛稿

邓小南◎著

LANGRUN XUESHI CONGGAO



# 朗润学史丛稿

邓小南  
著

 中华书局  
ZHONGHUA BOOK COMPANY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朗润学史丛稿/邓小南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6

ISBN 978-7-101-07410-9

I. 朗… II. 邓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文集  
IV. K220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0990 号

---

书 名	朗润学史丛稿
著 者	邓小南
责任编辑	王传龙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<a href="http://www.zhbc.com.cn">http://www.zhbc.com.cn</a>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68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34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
印 数	1—25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07410-9
定 价	78.00 元

---

## 出版弁言

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，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，已经将近而立之年。

中心创立伊始，我们的前辈邓广铭、周一良、王永兴、宿白、田余庆、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“多出人才，快出人才；多出成果，快出成果”的方针。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，从容涵育，术业各自有专精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

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，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，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，我们决定编辑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》。《丛刊》将收入位于前沿、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，包括中心科研人员、兼职人员、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、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。

致广大，尽精微，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。我们将为此而努力。

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#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

(第一种)

## 丛刊编委会

主 编 邓小南

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

编 委 (依音序排列)

邓小南 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
侯旭东 (清华大学历史系)

刘浦江 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
罗 新 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
荣新江 (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)

沈卫荣 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)

王利华 (南开大学历史学院)

吴玉贵 (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
张 帆 (北京大学历史系)

# 自序

和其他学者的自选集不同,这本论集的编纂,完全是在学生的推动下进行的。

我自己尚未酿就收拾旧作的心情,觉得还不到值得总结的成熟时机。这或许是因为,自己在学业上起步很晚——被称为“老三届”的我们这一代人,较我们的前辈、后辈,学术生命要短许多。在我们这个年龄,我们的前辈师长早已经典迭出,著作等身了;比起著述丰厚的同辈,自己也距离颇远。总感觉还没有深刻领悟学术的真谛,没有走出有特点的学术道路,没有真正形成学术的自觉。而尽管顾虑重重,还是在学生集体建议下勉力拿出这些文稿,是希望藉机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回顾,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,也得以就教于诸多方家。

—

1978年,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在高考恢复后首次招生,我在班级里算是年长的(可以引为安慰的,是一向有“大姐”之称),当时自己的感觉,是赶上了末班车,很希望能够“把失去的时间再追回来”。读书期间,各门课

程中名师云集。不仅是本系的老师积极上讲台,校外的刘乃和、王利器、宁可、漆侠、胡如雷、蔡美彪等先生都曾先后应邀前来授课。在“科学的春天”这样一种大环境下,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珍视这种机会,心气很高。

大学二年级,我选修了敦煌学课程,在王永兴、张广达二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,阅读《资治通鉴》与两《唐书》等史籍和陈寅恪先生等前辈著述,开始体味到“研究”二字的份量,有志于寻其门径,窥其堂奥。从本科高年级到研究生期间,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宋代历史,突出地觉察到时代间的内在延续与更革变迁,不满足于依朝代起讫切割时段的研究方式。与此同时也深切感到,宋史学界在对于材料的敏感、议题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等方面,应该取法于魏晋隋唐史学界。

本科期间,开始尝试发表考订性的文章。先后刊出的两篇,即《司马光〈奏弹王安石表〉辨伪》和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〈伯二五五五〉校释》,都是课业中的札记、作业。值得一提的,或许是自己投稿被拒的经历。我的本科毕业论文,是写两宋之交的传说“泥马渡康王”,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订与“泥马”相关的崔府君其人。文章曾经向南方一家刊物投稿,却始终没有回音。10年后拿出来再看,不由得很感谢当初拒用的编辑,留给我重新认识与改写的机会。此时的思考方向有了明显的不同,关注重点落在了与该传说相关的事件,以及这些事件在南宋初期发生的政治影响。《关于“泥马渡康王”》一文在我本科毕业13年之后,于1995年底刊登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上。

我的硕士论文选题,受到唐史方向的一位师兄启发,准备做宋代的考课制度。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,感觉宋代文官的考选升迁是一复合式体制,单纯抽出考课一项,不足以准确定位、从整体上予以把握。于是将论文题目调整为《北宋的考课与循资——宋代磨勘制度研究》。1990年代初,在漆侠、吴宗国、王曾瑜等先生的鼓励下,修订补充,写成了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》一书;先父邓广铭先生欣然为之作序。2000年秋,在日本东洋文库的一次会议上,中岛敏先生郑重讲到该书对于日本学者译注《宋史·选举志》的帮助,看着先生手中已经篇页散乱又精心补缀过的这本小书,我在感动之余,竟一时无语。

198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,我自己的研究方向,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:一是宋代的政治史、制度史,前者包括当时的政治文化、政治群体和政治事件,后者主要涉及官僚选任、官员考察和文书处理机制。二是宋代的社会史,包括女性史、家族史、士人网络与基层社会组织。研究过程中,经常感觉到不同课题之间的关联与历史内在的融通,也希望能自专题入手,对研究中的界域和屏障有所突破。具体议题的选择,有些是读书期间的学术兴趣引导所至,像有关文官课绩、选任和资序体制的诸篇,有关政绩考察和信息渠道的研究,大体上是这一脉络延伸的结果;有些受到集体性研究项目的引领,像对于吐鲁番女性的研究,对于苏州朱长文、龚明之家族的研究,对于山西洪洞用水秩序的研究等等;也有些选题,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启发。

任教25年间,个人对于历史的观察体悟时时渗透在课堂中,而研究的一些选题,最初又是来自教学中的感受。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,使我有更多机会思考不同朝代间的衔接与变迁,像《走向再造: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》、《试谈五代宋初“胡/汉”语境的消解》等文章,即试图突破王朝断限,以期较为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。《试论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:以北宋时期为中心》(后来发展为《祖宗之法——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一书),内容的展开也是受益于教学:自从80年代后期讲授宋辽金史专题,有关赵宋“祖宗之法”的问题就一直在脑际徘徊。《掩映之间:宋代尚书内省管窥》议题的出现,是在指导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注意到,对于宋代内廷高端的文书处理方式,认识至今含混模糊;《剪不断,理还乱:有关冯京家世的“拼织”》也是在带领学生搜讨研读材料的实习中,有感而来。《宋代历史再认识》、《走向“活”的制度史: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》和《永远的挑战: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》等诸篇笔谈,都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。

《走向“活”的制度史》一文,本来是2001年提交给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主持的“宋代制度史百年”研讨会议的短篇,其后发表在《浙江学刊》,当时并未料到会对青年学子产生影响。感到汗颜的是,此后我几乎不再敢写制度史的文章,担心个人实际从事的研究,无法令读者和自己满意。在后来的教学实践



中,对于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联,对于何谓“活”的制度史,有着不断的反思。我曾经对学生说,所谓的“活”,绝非浮泛飘忽,只有肯下“死”功夫,把根基扎在泥土中,才能“活”得了。“活”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。新议题、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,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、制度条文,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。新材料的牵动,能使研究“预流”;深读“坊间通行本”,也可能发人所未发。也就是说,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,而进退之宜、运用之妙,则存乎一心。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,算是对于该认识的一次实践。

在写作实践中,学人通常是“顺着”历史事实自有的发展逻辑摸索叙述;而议题的浮现,其实往往受到现实问题的刺激和现有研究的启迪,而生发出“逆向”的回溯。研究过程中,经常感觉到历史源流对于“今日现象”的意义,希望能够触及这表象背后的脉络与由来。

我们所面对的“历史”本身,无疑是具有历史性的。历史的真实场景一过即逝,而对于这种“真实”的追求,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。学人之所以会乐此不疲,是由于其中充满着往复对话,充满着新材料、新思维的刺激,充满着再认识的兴奋。这种“再认识”,本质上是批判性的:既有敏锐的观察,又有沉潜的琢磨;既包括对于个别史料、史事的审视辨析,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路径的探索与反思。

历史学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学科,却是充满人文关怀、睿智博通的学问,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。当今的中国,自历史中走来;无论个人具体的追求是什么,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日与明天。这种丰厚的积淀,是我们心灵中的“魂”与“根”,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,也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。

## 二

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,我最怕听到的是“家学渊源”。在这方面,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。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。我知道,我走上史学道路,父亲是感到欣慰的。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,父母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;对于我的志向选择,也从未过多干预。这是出于父亲

的开明,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,以前我从未想过。回头来看,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,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“平日不言之教”。生活在一个艰难与期望并存、坎坷与憧憬共生的时代,从前辈到我们,都有诸多无奈,也有不甘放弃的奋争。“味无味处求吾乐,材不材间过此生”,老庄的哲思,稼轩的慨叹,时常在心中盘桓。

我经常感觉到自己是比较幸运的。即便是在“文革”期间那艰难的岁月中,北大荒的老职工们也曾用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们“知青”。研究生毕业后,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学任教,受到前辈师长的扶掖,得到朋辈学友的温暖。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,1980年代初由邓广铭、周一良、田余庆、宿白、王永兴等学界前辈共同倡导建立。筚路蓝缕,发展为如今的学术重镇。在这一研究群体中,旨趣各不相同的学人相互理解,彼此尊重,切磋琢磨。开阔的视角、敏锐的思绪,时时映入眼帘。这种纯净自然的学术氛围,润物无声的滋养沃泽,使我受益匪浅。

这些年来,学生们经常是我文章的第一批读者。他们活跃而犀利的评论,常能予人启发,也使我看到日后学界的希望所在。我从1970年代边疆农村茅草土坯校舍中的小学教师,到80年代站上北京大学的讲台,环境条件有巨大变化;不变的是:面对学生澄澈无邪而渴求真知的目光,时时感到自己的责任。和学生在一起,作为一名教师,是我毕生的幸事,也是对于自身能力素质的锻炼及挑战,这种经验使我感受工作的意义,享受人生的价值。

我明白,与前辈、同辈相比,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明显欠缺,研究面相当狭窄;意识到应该拓宽,却又感觉力不从心。回首看看这些年的经历,应该说,自己的“道路”是边摸边走,而不是规划好蓝图,胸有成竹,再按部就班去建设的。在有限的活动范围中,我希望效法前辈的精神气象,也争取做得切实。朱子说“学者悠悠是大病”,这不仅是用以提醒学生的话,更是经常告诫自己的箴言。

八年前,我所敬仰的前辈李埏先生,在赐赠大著文存的同时,引述了陶弘景的诗句“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”。老先生虚怀若谷、洒落旷达的境界与襟怀,面对旧作之审慎郑重态度,使我非常感动。我理解先生那寥寥数语

中,寓含着对于后辈的叮咛;也清楚地知道,学人的表现,最终要靠文章说话,作品一旦完成,自我解释就显得多余。今天,自己的论文将要结集面世,心中十分忐忑,不知奉献给读者的,是否称得上合格的作品。

### 三

这部文集,大体上呈现出我个人的一些学史心得。而这些“学史”文稿的丛编,以“朗润”命名,既是因为自己歆慕学人治史的晴朗润泽、温和蕴藉气息;也是因为大概可以说,我的学史生涯自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开始,也在朗润园得到延展。从1961年随父母入住朗润园,到2001年我和先生、女儿迁居蓝旗营,除去中间在北大荒将近10年,前前后后在燕园这静谧的角落里生活了30多年时间。八九十年代的朗润园,被称为“北大的中南海”,曾经是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。而在2001那一年,我所工作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又迁入了朗润园。如今的这片天地,有古史中心,也有国家的发展研究院,传统的屋檐下,洋溢着活力与生机。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涵沐于这派勃勃生气之中。

论集中收录的文章,内容基本维持原貌,少数篇章的文字略有调整。现在读来,感觉内容阐发不准确、不到位处颇多,如果是重新研讨重新结构,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及表述方式。文章中涉及的不少问题(例如司马光文集的版本问题,例如崔府君信仰的问题,等等),已经有了更为专门细密的研究、更加确当深入的成果,敬请读者参照。文章中原本注释方式各不相同,学生们不惮烦劳,帮忙做了补充统合工作。征引文献版本,未予通同统一;有些出处,为便于读者查阅,更新为近年来正式出版物的刊发信息。

最后,要感谢中华书局多年来对于学术事业的鼎力支持。非畅销的学术读物得以面世,仰赖于出版界同道的热心与扶助。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,承蒙李岩、徐俊先生关心过问,谨致以由衷谢忱。

邓小南

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

# 目 录

自序 .....	(1)
试论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: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.....	(1)
走向再造: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.....	(36)
试谈五代宋初“胡/汉”语境的消解 .....	(74)
关于“泥马渡康王” .....	(95)
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.....	(112)
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 .....	(134)
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“实迹”:要求与现实 .....	(153)
“访闻”与“体量”: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.....	(177)
掩映之间: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.....	(210)
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: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 .....	(253)
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:以苏州为例 .....	(279)

“内外”之际与“秩序”格局: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 《周易·家人》的阐发 .....	(318)
剪不断,理还乱:有关冯京家世的“拼织” .....	(347)
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: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 .....	(372)
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: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 交游与沉浮 .....	(414)
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: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 “民间”与“官方” .....	(448)
司马光《奏弹王安石表》辨伪 .....	(473)
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 .....	(482)
校点本《宋史·余天锡传》补校一则 .....	(490)
宋代历史再认识 .....	(493)
走向“活”的制度史: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 点滴思考 .....	(497)
永远的挑战: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.....	(506)
宋代政治史研究的“再出发” .....	(515)
父亲最后的日子 .....	(525)

# 试论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： 以北宋时期为中心

追念祖宗之世、推崇“祖宗之法”(或曰“祖宗家法”),是赵宋一朝突出的历史现象。两宋对于“祖宗之法”的重视与强调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我们讨论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、各层级权力结构的分立与集中、“守内虚外”格局的展开、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、官僚机制运作过程中上下左右的维系,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,如此等等,处处都会遇到所谓“祖宗之法”的问题。事实上,宋代政治史中诸多事端的纽结正在于此。或许可以说,离开对于“祖宗之法”的深切认识,则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,揭开宋代政治史之奥秘;同时也难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之精髓。

关于宋太祖、太宗的创法立制及宋朝家法的形成,关于宋朝家法对于北宋政局的负面影响,十多年前邓广铭先生在其《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》一文中已有深刻论述;近年间学界围绕相关问题亦有不少直接或间

接的讨论<sup>①</sup>。本文希望能够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有所补充。

## 一、从“务行故事”到“祖宗之法具在”

——北宋前期“祖宗之法”的提出以及其后的强调重申

### (一)

宋人心目中的“祖宗之法”(“祖宗家法”),是一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。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,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;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,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。从根本上讲,它是时代的产物,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、制度交汇作用的结晶;其出发点着眼于“防弊”,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。应该说,“祖宗之法”体现着赵宋一朝的政治经验,是多年以来经由动态累积汇合而成的。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历代开国者所颁布的具有本朝特色的律令规则,常被称之为“祖宗故事”乃至“祖宗圣训”。引述祖宗朝的典制法规,以其作为目前事务的裁断准则,这种作法,前代亦有,并非首见于宋。然而,将其凝聚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精神,奉扬为一个朝代神圣的政治号召;大到朝廷决策的理论依据,小到任用官员、确定则例……凡事举述“祖宗之法”,则是至宋代强化突出的。这种动辄引述列祖列宗的作法,在其后的元明清诸代,也都曾对当时的政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<sup>②</sup>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,直接或间接研究宋代“祖宗之法”(“祖宗家法”)的论著日多。就其广义进行研究者,主要有邓广铭:《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》(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6年第3期,85—100页)、唐兆梅:《试论北宋的“祖宗家法”》(《汕头大学学报》1987年第1期,26—31页)、王水照:《“祖宗家法”的“近代”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》(见氏著《宋代文学通论》之《绪论: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》,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7年,4—18页)等;就其狭义进行研究者,有张邦炜:《论宋代“无内乱”》(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1988年第1期,53—60页)等。

<sup>②</sup> 有关明代的典型例证,参见许振兴:《论明太祖的家法——〈皇明祖训〉》,《明清史集刊》第三卷,1997年6月,69—96页。

围绕“祖宗之法”，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，例如“祖宗法”、“祖宗家法”、“祖宗之制”、“祖宗典制”，等等。诸多说法的共同点，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。

把宋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，将其称之为“祖宗典故”、“祖宗之法”，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，始于北宋真宗时期。揭举这一旗帜的直接创意者，应当说是有宋一朝著名的“贤宰相公”李沆、王旦等人以及一批失意于治的士大夫。尽管宋代有些士大夫征引《诗》称周武王“绳其祖武”、成王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”以及“毋念尔祖，聿修厥德”等辞句，作为奉行祖宗法度的理论依据，但事实上，“祖宗之法”在当时的提出，并非光大儒家理念的直接产物，而主要是在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长期社会实践中酝酿反思的结果。

如何保证长治久安，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，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。自宋太祖始，即经常与臣僚谈及如何使子孙世代谨守开国以来所创立的法度。南宋绍兴(1131—1162)初年，宰相吕颐浩曾与高宗说起太祖时的一件事：

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，其一有云：“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，所创法度，子孙若能谨守，虽百世可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开宝九年(976)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，曾经明确说道：

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，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，纪律已定，物有其常。谨当遵承，不敢逾越。<sup>②</sup>

太宗的即位，经常受到非议；他的施政作风，也与太祖有诸多不同。但是，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后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，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

<sup>①</sup> 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(以下简称《系年要录》)卷六一，绍兴二年十二月癸巳条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<sup>②</sup>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卷一七，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382页。



验,继承其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,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。从宋朝“文治”传统之形成过程来看,太宗的所作所为,影响比太祖更为具体直接。

太平兴国八年(983),太宗对臣僚们说:

中国自唐季,海内分裂,五代世数尤促,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。朕虽德不及往圣,然而孜孜求治,未尝敢自暇逸,深以畋游声色为戒。所冀上穹降鉴,亦为子孙长久计,使皇家运祚永久,而臣僚世袭禄位。<sup>①</sup>

类似的谈话有许多次。至道元年(995)八月,太宗立三子寿王为太子,同时改其名为赵恒。当时,他抚着儿子的后背,特别说明了改名之深义:“名此,欲我儿有常德,久于其道也。”此事对于真宗赵恒影响颇深,他作皇帝之后,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者,他即举述此事作为拒绝的理由<sup>②</sup>。

至道三年四月,宋真宗即皇帝位,制书中强调说:

先朝庶政,尽有成规,务在遵行,不敢失坠。<sup>③</sup>

此后,在仁宗乾兴元年(1022)登极赦中,说“夙侍圣颜,备承宝训,凡百机务,尽有成规,谨当奉行,不敢失坠”;英宗嘉祐八年(1063)即位诏中,也说“夙奉圣颜,备闻圣训,在于庶政,悉有成规,惟谨奉行,罔敢废失”<sup>④</sup>。这类规范一律的语言,并不仅仅是表面文章,而是为当时国家政治局面的发展定下了基调。

北宋建国以后,立足于矫枉防弊,创法立制,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、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。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、“先其大纲”、重在维系制约

---

① 杨亿口述,黄鉴笔录,宋庠整理,李裕民辑校:《杨文公谈苑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48页。

② 《长编》卷四二,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条,887页。

③ 《长编》卷四一,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条,863页。

④ 李攸: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《登极赦》,丛书集成初编本,21—22页。